

## 软权力建设路径之探讨〔\*〕

——以西欧在非洲软权力构建为例

○ 孙建社<sup>1</sup>, 杨鸿柳<sup>2</sup>

(1.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西欧在非洲软权力的构建长期而深远,纵向看可以分为殖民统治时期、独立后初期与后冷战时期三个阶段;横向看可以从政治制度、宗教文化和外交政策三个方面进行构建。从西欧在非洲软权力构建的三阶段和三方面中可以看出其构建特征为:构建软权力的资源,不仅包括无形资源也包括有形资源;构建软权力的方式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软权力实施对象不仅有非洲各国权力结构的上层人物,也有非洲各国的基层民众。由此引发对软权力建设路径的思考:软权力构建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在构建中还需重视软权力资源的适宜性。

〔关键词〕西欧;非洲;软权力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2.020

软权力理论的探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学界主要集中于对软权力的来源、软权力的含义、软权力的作用及软权力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解读,但对软权力建设路径的探讨不足。通过分析西欧在非洲软权力构建,我们可以深化对软权力建设路径的认识和借鉴。

### 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西欧对非洲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从 1960 年的“非洲独立年”算起,非洲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已近 60 年。然而,在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至今依然能够看到殖民主义

---

作者简介:孙建社(1953—),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杨鸿柳(1988—),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欧与非洲关系研究。

〔\*〕本文系 2017 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7MLB001)阶段性成果。

的种种遗产,能发现西欧国家(尤其是英、法两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如非洲的教育保留了殖民时期的体制和结构,<sup>[1]</sup>非洲的基督教信徒占非洲人口的46.53%,非洲国家普遍选择实行了西方式的总统制和多党制,<sup>[2]</sup>欧盟推行的民主、人权、良治观念在非洲国家不断深化扩展。<sup>[3]</sup>尽管前殖民宗主国不是最受青睐的对象,但他们依然被视为是对非洲最有影响的国家。据2014—2015年度“非洲晴雨表”的调查,就当前外部国家影响力而言,在36个非洲国家中有28%的民众选择前殖民宗主国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中,在中部非洲(55%)和西部非洲(45%),前殖民宗主国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认为前殖民宗主国最具影响力的民众中,年轻人的比例居高。

这些现实不得不使人们思考为什么新生代的非洲人对西欧国家有更高的认同?为什么西欧能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国家中沿袭西方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为什么非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欧国家所推行的民主、人权、良治等价值观念?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除了学界经常讨论的殖民传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欧洲中心主义之外,还有西欧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对非洲的软权力构建。

然而,目前学界对于西欧在非洲软权力构建问题的研究还很少,大多只是探讨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历史、非洲反抗殖民主义斗争史以及非洲民族主义史等。这些研究所涉及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仅仅从命令他人改变行为,违背其最初的行为偏好的视角研究西欧与非洲的关系,而没有从塑造他人的偏好来影响其行为的视角研究西欧与非洲的关系。也就是说,目前学界尚未从软权力的角度去探讨西欧对非洲的影响,特别是没有说明西欧国家对非洲的软权力是怎么建立起来并达到今天这个程度的。另外,目前有关西欧对非洲影响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侧重于研究特定时段内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政策给非洲带来的影响。现有的研究成果,要么只是对殖民与反殖民的研究、要么只是对原宗主国的非殖民化政策与非洲国家去殖民化斗争的研究,而没有从整个历史进程探讨西欧与非洲关系的相关学术成果,尤其欠缺从整个历史进程研究西欧在非洲软权力建设的学术成果。因此,本文将从软权力建构这个角度深入探讨西欧对非洲的影响。具体探究西欧国家对非洲软权力是怎么建起来并达到今天这个程度,西欧对非洲软权力构建方式有哪些特征,西欧对非洲的软权力构建能够引发我们怎样的思考等。

## 二、西欧对非洲软权力构建的历史进程

这里所说的“西欧”主要是指对非洲殖民地影响最深远的英、法两国,以及继英、法之后对非洲影响较大的欧盟/欧共体。而“非洲”主要指历史上曾经是英国与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国家,也包括独立后的整个非洲大陆国家。与此同时,这里所考察的范围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探讨西欧对非洲软权力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从纵向来讲,主要分为殖民统治阶段(1526年—1960年)、独立后的初期阶段(1960年—1991年)、后冷战阶段(1991年至今)三个历史阶段;从横向来看,

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宗教文化和外交政策等方面探讨西欧对非洲的软权力构建。

### (一)殖民统治阶段(1526年—1960年):以军事手段推动软权力的构建

这一时期英、法等西欧国家主要以军事手段,推动其宗教文化等软权力因素在非洲的渗透。首先是英、法等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殖民占领。英、法等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侵略和瓜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占领西非殖民据点)、19世纪初至1876年布鲁塞尔会议(从奴隶贸易转向殖民奴役、加强对北非国家的侵略、积极策划侵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1876年至1884年柏林会议(掀起瓜分狂潮)、1884年至20世纪初(对非洲最后的瓜分)。在上述四个阶段侵略和瓜分过程中,英、法等殖民主义者主要依靠武力征服、镇压以及威胁、诱骗等手段同非洲各地统治者订立“保护”条约,渐置对方于殖民地位。在此基础上,英、法等西欧国家对非洲以武力推动其宗教、文化、政治制度等软权力因素在非洲的渗透。

一方面,英、法等西欧国家以武力推动其在非洲的宗教和文化渗透。从西欧国家殖民入侵到19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已经初见成效;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晚期基督教在非洲广泛传播;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传播进入鼎盛时期,在空间上,由沿海向内陆推进,逐渐遍及非洲殖民地国家,在效果上,达到基督教的非洲化。基督教会传播的价值观主要表现为:政治认同(影响公共领域的话语和价值观、建构进入公共领域话语传播的合法性、提倡信仰认同基础上的政治认同)、族裔认同(译经运动促生和深化族裔认同、促进民族的划定)、民族认同(弱化传统宗教、弱化传统文化、形成次国家认同、形成超国家认同)。最终结果是泯灭被统治者的人性,剥夺非洲人的理性能力,为殖民者获得统治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外,伴随着基督教价值观的传播,英、法等西欧国家还通过教会办学(宗教团体主导学校教育)、教会与政府合作办学(确立官方教育系统)、学校教育规模扩大等方式,推动其语言文化在非洲的传播。这些宗主国语言和文化对非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宗主国语言和文化在非洲开始传播、宗主国在非洲的合法权威逐步确立、非洲国家民众的被殖民身份得以内化等。

另一方面,英、法等西欧国家以武力推动其在非洲的政治制度的移植。西方宪政在非洲的移植分为三个阶段:殖民早期,在西方法律制度粉饰殖民行为的政策主导下,通过“间接”或“直接”移植方式输入到各殖民地,进而开启了非洲制定宪法的活动。殖民中期,“直接统治”间接化,“间接统治”普及化,非洲自此进入全面引进西方宪政体制阶段。与此同时,非洲人民民族意识在宗主国政治生活影响下开始觉醒,迫使殖民者吸收他们参加政治生活。在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非洲各国相继完成宗主国模式的宪政创制。独立前夕,去殖民化过程中,英、法通过推行一系列宪政改革,为殖民地主动设计宪政框架,将西方宪政进行深入移植,促使非洲各国在妥协中走向独立,进而形成了西方翻版的宪政体制。

### (二)独立后的初期阶段(1960年—1991年):以经济为手段推动软权力的构建

1960 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非洲大多数国家获得独立后,英、法等西欧国家改变了过去以军事干涉为主的老殖民主义方式,开启了以经济为手段推动软权力构建的新阶段。这时期“欧共体”作为西欧的一个整体,对非洲以经济援助推动软权力的构建,主要进程如下:

1963 年欧共体与 18 个非洲独立国家签订《雅温得协定》,规定欧共体对这些国家援助 7.3 亿美元,并且在关税、贸易、投资等方面给这些国家优惠待遇。1966 年和 1968 年,欧共体分别与尼日利亚签订了《拉各斯协定》,与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签订了《阿鲁沙协定》。这两个协定的内容同《雅温得协定》大体相似。1969 年,欧非又续签了第二个《雅温得协定》,此后的五年中,欧共体的援助金额增加到 10 亿美元。1975 年,欧共体与非加太国家签订了《洛美协定》,主要涉及贸易合作,稳定出口收入,工业合作,财政和技术合作等内容。1979 年,签订第二个《洛美协定》。新协定中,农产品贸易优惠范围有所扩大;稳定出口收入制度适用的产品扩大到 44 种;增设了支持矿产品生产和出口制度,保障 6 种矿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力;援助金额增加为 57 亿欧洲货币单位。1984 年,签订了第三个《洛美协定》,除了对前两个协定所提供的优惠稍有扩大外,强调双方缔结合作协定的目标是促进和加速非加太国家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该协定强调政策对话,要求将“保障条款”“尊重人权”等条款写入新协定。1989 年,签署了第四个《洛美协定》。规定了合作总目标、合作领域、合作方式。重申人权保障,并确定合作的总目标是以促进人的发展为导向,合作关系与人权保障相联系,人权包括在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权利,并且各种权利不可分割、相互关联。

概而言之,从 1963 年到 1989 年,欧共体在涉及对非洲经济援助方面,分别签署了《雅温得协定》《拉各斯协定》《阿鲁沙协定》和《洛美协定》。这一系列协定,不仅涉及欧共体对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基金,给予关税、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特殊优惠待遇的内容,而且还有涉及人权、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条款。例如,第二、第三、第四个《洛美协定》,都明确写入“尊重人权”等条款,并协助和促进非洲国家的人权、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可见,西欧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其他方面的特殊优惠待遇,是以非洲接纳西欧的人权、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为前提的。

### (三)后冷战阶段(1991 年至今):以规范性力量巩固和发展软权力

所谓规范性力量是指“观念的力量”,是塑造国际关系中“规范”的能力;它既不单纯依靠军事手段也不单纯依靠经济手段,而是通过思想和观念来影响他人。<sup>[4]</sup>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盟将“促进和平、推动欧盟价值观和促进人类的福祉”确定为对外政策的一个目标,正如欧盟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欧盟的目标是坚持和促进上述价值观。”<sup>[5]</sup> 因此,欧盟不仅继续推动经济一体化发展,而且强调价值规范的扩展。其中,最突出的是推动民主、人权、良治等价值规范向非洲的渗入,即通过经济合作、贸易协定、资金援助等方式,将其价值规范向非洲国家移植,以巩固和发展其对非洲国家的软权力。2000 年《科特努协定》规定,欧盟与

非洲的政治对话,应包括对尊重人权,民主原则,法治和善政的事态发展的定期评估。它要求非洲国家建立负责任的权力机构,制定透明的决策程序,强调法律在管理和分配方面的首要地位,采用有效的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措施。2005年12月,欧盟理事会通过《欧盟对非战略:走向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强调“民主、人权和良治是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前提。”<sup>[6]</sup>2006年欧盟委员会通过《欧洲发展治理共识——欧盟协调一致方法》文件,制定了对非洲人权、民主激励机制,承诺对那些在民主治理改革计划中取得具体成果的国家给予额外的资助。<sup>[7]</sup>2007年欧非峰会通过了《非欧联合战略》及《行动计划》,将欧盟非洲新型关系定位为“成熟、负责和相互尊重的平等伙伴关系”,特别指出“促进民主治理和人权是欧盟伙伴关系的核心特征”。<sup>[8]</sup>

总之,冷战结束之初,由于非洲在欧盟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并且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非洲开始增加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交往,并越来越多地吸纳来自欧洲以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与援助。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原来将“人权”作为附加条件的对非经济援助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对非影响力。因此,欧盟改变过去将人权与经济援助直接挂钩的政策,开始将“人权”纳入“治理伙伴关系”范畴中,并赋予“治理”以广泛内涵。这一内涵不仅包括人权、民主、良治,还包括气候、安全、能源、移民等。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不是将上述“治理伙伴关系”作为欧盟对非经济援助的附加条件,而是作为从非洲自主发展出发,从非洲自身利益需要的角度推销其“治理”理念的,并强调这是非洲自身的责任。根据这一“治理”内涵,西欧与非洲之间是平等的“治理伙伴关系”,并且欧盟的价值规范,不再被看作对非援助的附加条件,而是欧盟与非盟共同的价值追求。这样一来,不仅使非洲国家更有意愿接纳欧盟的价值规范,而且将这些价值规范具体落实到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从而扩大了欧盟的影响力,巩固并发展了对非洲的软权力。

### 三、西欧对非洲软权力构建的特征分析

西欧对非洲软权力的构建过程中,无论是权力资源的运用,还是软权力构建方式的调整,或者是软权力实施对象的选择,都表现出其自身的特征。实践证明,这些特征都有助于软权力的构建和形成。

(一) 西欧在非洲构建软权力的资源,不仅使用无形资源,也包括有形资源

在非洲的软权力建设,西欧不仅运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宗教文化、外交政策等无形资源,还适当结合军事力量、经济诱惑等有形资源。殖民统治时期,西欧主要结合武力资源推动软权力的生成,后殖民时期则主要结合经济资源推动软权力的发展。

约瑟夫·奈将软权力界定为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能力。这种吸引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sup>[9]</sup>就文化而言,当一国的文化中包含了普世价值观,其政策中体现的也是被

他国认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双方就会建立一种兼具吸引力和责任感的关系,该国得偿所愿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大大增加;就政治价值观而言,政治价值观能够强烈影响他国的喜好,因而它也是软权力的一个来源;就外交政策而言,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和道德权威感是软权力的又一来源。由此出发,似乎软权力的构建只能运用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等无形资源,而硬权力的构建只能运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有形资源。事实上,上述对应关系并不是绝对的。由于权力资源的运用方式不同,在特定的情况下,有形资源(军事力量)也可以产生软权力行为,如美国常常运用军事力量(有形资源)在盟国之间建立信任与信赖(软权力行为)。再如,“像中国这样成功的经济(有形资源)表现既可以产生制裁和限制市场准入的硬实力,也可以产生吸引和效仿成功样板的软权力”<sup>[10]</sup>。

## (二) 西欧在非洲构建软权力的方式,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1526年至1960年是西欧列强在非洲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时期,这一时期西欧国家主要运用武力征服手段,推动其宗教、文化、政治制度等在非洲的传播,即以军事手段推动软权力的构建。1960年至1991年冷战结束是非洲独立后的初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西欧主要运用经济援助,推动其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在非洲的扩展,即以经济手段推动软权力的构建。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西欧主要以规范性力量,比如人权、民主、良治等规范性理念巩固和发展其在非洲的软权力。由此看来,在上述三个历史阶段,西欧在非洲构建软权力的方式都进行了适时的调整。

在三个不同阶段中,权力的实施者(西欧)和实施对象(非洲)都是相同的,但为什么在不同阶段西欧在非洲构建软权力的资源和方式都是有差异的呢?原因在于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决定了权力实施的三种不同情境,而“哪种资源能够提供最佳的权力行为基础”则取决于“某一特定的情境”。例如,森林中的坦克车难以发挥其作为有形权力资源的作用,工业时代到来之前石油并不是重要的权力资源,铀也是因为核时代的开启才变得重要。<sup>[11]</sup>因此,西欧国家需要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在非洲软权力构建的资源和方式。

## (三) 西欧在非洲软权力实施对象,不仅只有非洲各国权力结构的上层人物,也包括非洲各国的基层民众

一方面,西欧针对非洲国家上层人物进行软权力构建。殖民扩张统治时期,西欧通过强制、诱惑等手段,以笼络非洲国家部落上层人物,使其接纳西方宗教、文化以及管理制度。民族解放运动时期,西欧殖民者在得到民族资产阶级保持西方式政体、进行温和的社会改革等承诺后,比较顺利地将西方式政体连同国家的统治权交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温和派手中。而这些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大都接受过西方式的高等教育,受西方文化观念和政治思想的影响很深,对西方式政体尤其是原宗主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强烈的认同感。非洲国家独立后,原来领导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们变成了民族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在与殖民当局折中妥协建立起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统治后,便竭力维持西方式政体

的生存和延续。同时,西欧还利用经济援助或规范力量,影响非洲国家的政府组织形式,从而使一些非洲国家在独立后仍然承袭西方殖民政府的管理机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

另一方面,西欧针对非洲国家基层民众进行软权力构建。西欧在非洲软权力的实施对象,不仅只有非洲各国权力结构的上层人物,也包括非洲各国的基层民众,甚至更加重视对后者的宗教文化和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念的灌输。殖民统治时期,西欧通过在非洲各地办教会学校,培养非洲牧师,并通过他们使西方宗教文化在非洲广泛传播。通过这种方式,既使受过教会教育的非洲人以代理人的身份为西欧的商务和殖民统治服务,又使非洲基层民众接纳西方宗教文化。后殖民时期,西欧对非洲输出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人类普世价值”。为此,西欧大力支持非洲国家记者职业技能的发展,提高非洲媒体的责任感和不受干涉自由表达的能力;通过资金投入对非洲教育领域的发展提供支持;通过与非洲高校合作,帮助非洲国家开发年轻一代人的智力资源;支持非洲国家的职业培训,以培养合格的技术人员;支持非洲国家在包括地区一体化等人文社会科学问题方面的研究等。

以上所述体现了西欧软权力构建的又一特征,即权力实施者对多个对象同时施加影响。实际上这也体现了“权力”概念的本质。权力的本质是一种关系,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的主体至少两个或多个,因此,软权力建设涉及多个相关主体。这些主体包括软权力的实施者和实施对象,其中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软权力的构建能否成功,更多地取决于权力实施对象对软权力资源能否认同。进一步讲,这里所说的软权力实施对象又分为非洲国家的政府和基层民众两部分。其中,后者(基层民众)对于构建软权力效果能够产生更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构成软权力的文化和价值观根植于公民社会,这些文化和价值观能否被接纳,更多取决于基层民众的认同,而不是由政府政策控制的。

#### 四、关于西欧对非洲软权力构建的思考

从整体来看,西欧在非洲软权力的构建历程能够引发人们一系列的思考:一是软权力的构建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立即看到投资回报;二是软权力的构建还具有一定的曲折复杂性,不仅道路是曲折的,而且构建方式也相当复杂;三是软权力的运用能否成功,是由权力实施对象所控制的,即更多地是要看软权力资源对权力实施对象是否能产生吸引力。具体来说:

(一)软权力构建的长期性。软权力的构建不能急于求成,它是一项长期积累的工程。纵观西欧对非洲软权力的构建,它始建于西欧对非洲的殖民侵略时期,发展于殖民统治时期,巩固于后殖民时期,贯穿于西欧与非洲关系史的整个过程。它既包括殖民扩张时期西欧殖民者的武力强行占领、西方基督教思想的渗入、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与对非洲经济结构的破坏和重建等;也包括后殖民时期,宗主国对非洲国家的去殖民化运动、促使非洲国家接纳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与

对非援助等；此外，还包括欧盟建立后，对非洲政策在人权、民主方面简单粗暴的干涉与促使非洲实现良治、实现对非洲的有效治理。可见，当前欧盟对非洲的软权力，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是循序渐进逐步形成的。

(二)软权力构建的曲折复杂性。这一曲折复杂性表现为多个方面：首先，软权力构建的路径是曲折的。例如，西欧宗教在非洲传播伊始，就遭到非洲国家酋长们的抵制，因为酋长们原是信奉部落宗教的，一般不愿改奉基督教。因而西欧传教士便努力争取他们的合法继承人，逐步使后来的部落上层人物接纳西方宗教。其次，软权力构建的方式是复杂的。如前所述，西欧在殖民统治时期主要以军事强制方式推动软权力建设，后殖民初期主要以经济援助方式推动软权力建设，冷战结束之后主要以推介规范性力量的方式巩固其在非洲的软权力，实际上，在任何时期都是以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构建软权力的。也就是说，软权力建设方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最后，外部影响因素加剧了软权力构建的复杂性。从目前影响欧盟在非洲软权力的外部因素来看，能够对非洲产生吸引力的，还有中国、美国等其他国际政治行为主体。这些行为主体对非洲的吸引力，加剧了欧盟在非洲软权力构建的复杂性。

(三)软权力资源的适宜性。软权力构建的关键，不在于软权力资源的先进性，而在于软权力资源与接受对象是否相适宜。例如，西欧政体在非洲国家的广泛建立和得以维持，是以适应非洲国家社会状况为基础的。在殖民统治时期，西欧政体在非洲的移植就没有引发过激的社会抗议。除了殖民者的高压政策和手段之外，这与西欧政体同殖民地原有政治文化传统之间存在一定的适应性有关。如非洲国家中央政府权力的弱化及地方封建势力各自为政，与西方封建社会“权力分化”政治原则有颇多相似之处；种姓或部族势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与西欧政治制度所体现的“利益分享”和“权力制衡”原则相似；非洲国家的长期分裂和文化形态的多元化，使西欧政体的移植未在非洲民族心理和文化意识上受到过多的抵制。

## 五、结 语

综上所述，西欧在非洲软权力的建设路径是长期的、复杂的，并且要求权力资源与实施对象是相适宜的。与此同时，西欧在非洲软权力建设方式的特征也给中国带来一些启示，即中国在扩大对非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中国需要综合运用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也就是说，中国对非不仅需要现有基础上，继续加强有形的经济资源的运用，而且还需要更多运用无形的文化资源，如更多举办孔子学院、接纳非洲国家学生来华留学、举办中非文化节和友好文化年活动等。另外，还要注重运用无形的外交政策资源，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理念。

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中国应该不断调整对非影响方式。冷战结束以后，非



洲地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成为世界较为动荡的地区之一。在这变化了的情境之下,中国需要调整对非的交流方式,以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如借助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平台,维护非洲安全,展现中国军队的和平使者形象。另外,还可以在现有亚丁湾护航、吉布提补给基地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以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

三是中国对非交流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政府或者说官方之间的往来,更要注重双方的民间交流。因为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能否被非洲接纳,更多取决于非洲国家基层民众的认同,而不是由其政府控制的。在以往的交流过程中,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官方交流远多于民间交流,今后应适当增加民间交流的比重,使两者均衡发展。例如,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担负经济合作共赢的任务,还有推介中国文化的使命。

### 注释:

[1][津巴布韦]费伊·钟:《今日非洲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十周年报告,http://www.un.org/chinese/esa/education/lifelonglearning/conclusion\_4.html,2017年5月10日。

[2]张宏明:《解读非洲部落主义对政治的影响》,国际网,http://memo.cfnisnet.com/2013/0122/1294295.html,2013年1月22日。

[3]Africa Union: Call for Papers: The Fifth Annual High Level Dialogue on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Governance in Africa: Trend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Yaoundé, Cameroon, Political Affairs, 2016年6月21日。

[4]朱立群:《欧盟是个什么样的力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

[5]European Union: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Strategy Paper, COM(2004) 373 final”, 12 May 2004.

[6]European Union Committee. “The EU and Africa: toward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34th Report of EU - Africa Partnership, 2006.

[7]“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Consensus on Development: Towards a Harmonised Approach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COM (2006) 421 Final, 8, pp.14-15.

[8]Union A. “The Africa—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A Joint Africa—EU Strategy”, 2007.

[9][美]约瑟夫·奈:《软权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10][11][美]约瑟夫·奈:《论权力》,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6、10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